

美学术刊物网站显示——

美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工冠状病毒合成技术

人民日报记者 张梦旭

美国学术刊物网站显示，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拉尔夫·巴里克，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技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国际舆论呼吁，为提高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等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改造技术

巴里克目前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和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介绍说，巴里克主要研究三种RNA病毒，其中包括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冠状病毒。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巴里克以自身名义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共发表400余篇论文，其中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高达268篇。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制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美国《病毒学杂志》网站显示，2002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可以在活体内进行，通过改变病毒的环境。美国等西方国家医疗条件先进，但疫情却加速蔓延，除变种病毒传染力强、疫苗免疫效果不如预期等技术性原因外，个人主义泛滥是导致西方疫情防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反智主义的社会根源

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统治可谓无处不在，它不仅主宰经济、掌控政治，还直接参与社会价值观塑造。从经济角度看，资本统治建立在剥削和压榨他人劳动成果基础之上；从政治角度看，它建立在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多数劳动者之上。因此，资本的统治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为了维持非正义的经济剥削和阶级专政合理化，被剥削者和被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其价值观必然是颠倒黑白、混淆主次的反智主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反智主义刻意回避阶级分析法，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取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将矛头对准资本。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普遍“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

在政治学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在价值观领域，以笃信宗教掩饰无视客观规律和现代科学，导致谬论流传。民调显示，美国迄今仍有1/3的人不相信进化论。特朗普时期的副总统彭斯曾表示吸烟不会致癌，还否定进化论，认为地球生命及智慧都是上帝创造的。美国自建国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大本营，首先是意识形态对立，同时基督教思想根深蒂固也是重要原因。基督教劝诫信徒要顺服上帝，靠上帝的祝福致富。而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唯物论和无神论等，对这些宗教信徒没有吸引力，甚至排斥。

为麻痹多数民众，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界精英还提出“奶头乐”理论，主张为了20%的上层人士高枕无忧，用温情、麻

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占人口80%的大众阶层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性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吸鸦片一样，令人浑浑噩噩。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2008年，巴里克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胞。“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一项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命形态。”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设计了一个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一致的基因组，并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替换为该基因组。这种新型嵌合病毒能够被蝙蝠和人体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2015年，巴里克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展开。这种经过基因操作的SARS样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这一研究成果2015年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2016年，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们以SARS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复制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可复制性。

2020年6月，巴里克做客美国“本周病毒学”播客，进一步阐述他的团队在自己的实验室“改造冠状病毒”的细节。他说：“改造新冠病毒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将至少四或五组不同的变异设定放入新冠病毒的受体结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和老鼠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

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表示，

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2020年9月，巴里克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三台节目“普蕾萨迪雷塔”（意为“直击热点”）采访时，当记者问道：“如果你不想留下痕迹，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毒，使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有区别，是吗？”他答道：“没错。你可以不留痕迹地进行合成，目前有三四种合成冠状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在实验室制造病毒。”

与德特里克堡关系非同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合作。巴里克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的“技术”，通过这些合作和人体被广泛运用在德特里克堡内。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SARS开展过科研合作。一篇2014年发表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就来自与这两个德特里克堡机构的合作。2018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丽莎·托泽夫斯基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感染了猴子。美国军方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作讲座，内容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副主任丽莎·汉斯莱正是巴里克的学生。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糟糕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次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

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关闭。据《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所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

巴里克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物实验室也有类似问题。据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报道，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其中，2016年2月，一名实验室女性工作人员被感染SARS样冠状病毒的老鼠咬破了手指，但在接下来的10天里，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被隔离，而是被允许戴着外科口罩在公共场所活动。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专栏作家毛罗·贾·萨蒙特日前发表题为“现在全世界都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文章说，一系列疑点已将病毒溯源的矛头对准德特里克堡，对其开放调查是病毒溯源问题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当我们看到有2000多万中国公民签名请愿，要求开放调查德特里克堡时，我想到，成千上万认为德特里克堡有疑点的菲律宾人也应该有机会向世卫组织请愿。这是国际社会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

马来西亚《东盟邮报》近日发表文章说，一群菲律宾记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网上发起请愿，敦促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正如请愿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德特里克堡仍然是一个不应被世卫组织专家忽视的谜。为提高透明度，世卫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和全球其他类似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载8月18日《人民日报》）

个人主义泛滥使美西方国家疫情雪上加霜

田文林

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说过：“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个体男人和女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属性。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恶等）的食物和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共鸣和体恤。

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18世纪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认为，实现有序社会的关键不是自利，而是找出驾驭自利的动源，并使之服务于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和方法。亚当·斯密曾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继亚当·斯密之后，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约翰·穆勒则将人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

“经济人”（理性人）假设更是明确将个人界定为精于盘算、矢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抽象个体。“经济人”主要遵循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任何偏离自利原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非理性”。这一假设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他人，一切行动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且只有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时才会遵守社会公德。

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整个社会的评价标准日益颠倒和错乱。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贪得无厌的行为总是不招人喜爱，被人鄙弃。但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人们对逐利行为后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个世纪前被社会唾弃的贪婪逐利行为被正当化，对财富的贪婪被视为人类再正常不过的合理诉求。恰恰是在这种“非道德化”过程中，资本力量日渐摆脱了社会道德的束缚，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资本的反社会属性从汨汨细流变成滔天洪水。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的达尔文，事实上十分强调互助意识的重要性。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道德品质。他认为，“社会本能”的发展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依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使人类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

共同体倾向，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再次，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个人主义产生后，“人民”的概念不再是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美国是我中间型代表。美国本身是个移民国家，号称“合众国”，实则境内各个族群、各国移民从未“合众为一”，形成统一的文化心理。美国大力宣传的推崇竞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将整个社会变成“原子化”个人的集合体。“原子化”个人的副作用就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民众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看似紧密相依，实则各不相容。

疫情暴露反智主义价值观的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的杀伤范围不分国籍、种族、阶级。因此，应对疫情最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主义精神，以及朝野同心、集体主义精神。遗憾的是，面对疫情，西方政客不是向病毒专家和防疫专家求救解决之道，反而回避矛盾，到处甩锅，并乞灵于各种旁门左道。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力量长期推行愚民政策最终引出恶果。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多年浸淫下，许多西方民众执着于“个人至上”信条，对所谓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抱有执念。这使西方民众面对疫情时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由此极大延误了疫情防控。在这些人的看来，政府采取的种种限制性举措（如居家隔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对个人权力的限制乃至侵犯。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西方民众经常公然违抗政府禁令，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举行抗议、集体聚会乃至开个人演唱会。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疑加重了疫情蔓延态势。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缺失，才使西方民众很难像东亚国家那样，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没有比较发现不了真理。中国能够取得令世界羡慕的抗疫成果，与中国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直接相关。中国历来有“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更是大力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国民众能够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举措（如封城、居家隔离、公共场合戴口罩等），使中国抗疫斗争真正成为没有死角的人民战和总体战，并最终确保了抗疫斗争的胜利。（载8月18日《光明日报》）

孟晚舟引渡事宜听证会结束

新华社渥太华8月18日电（记者李保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关于孟晚舟引渡事宜的听证会18日结束，但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官表示将于10月21日举行会议商定宣判日期。据加拿大媒体分析，由于加拿大大选9月20日举行，法官可能将于10月下旬对此作出裁决。

华为加拿大公司在听证会结束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声明，再次指出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中滥用法律程序的4个方面：政治动机、非法拘留、重大遗漏和错误陈述以及违反国际法。声明强调相信孟晚舟是清白的，支持孟晚舟寻求正义和自由。

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中方表示，加方应该反躬自省，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阿富汗局势引西方多重反思

核心提示

连日来，阿富汗局势成了国际社会的焦点：政局一夜突变不仅给阿富汗人带来巨大影响，也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舆论陷入深刻反思。有观点认为，美国军事干预阿富汗的政策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有舆论表示，盟友无法再信任美国；更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式民主不能强加于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20年前，美国以反恐为名带领盟友入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20年来，美国付出了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超过2万亿美元代价，最终却换得个美军仓皇撤离、塔利班重夺政权的结局。一些西方专家坦言，美国的军事干涉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波莉·汤因比认为，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再次将西方的傲慢和自大暴露无遗，“西方国家以为它们可以利用军事力量将阿富汗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这样的荒诞幻想到此结束”。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源自其失败的撤军政策，更是过去20年来种种失败政策的后果。

法国历史学者米歇尔·戈亚在《费加罗报》刊文指出，自2001年出兵阿富汗开始，美国一方面希望国内展现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平息“9·11”袭击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希望以最小的牺牲做到这一点，这种矛盾性使得其在阿富汗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灾难性的”。

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麦金利则分析了美国政府20年来的诸多失败：美国在反叛乱、阿富汗国内政治以及“国家建设”方面的政策都失败了，美国长期以来错误估计阿政府军和塔利班的能力，还误读了地区地缘政治的现实。

为了自己能早日从阿富汗的战争泥潭中脱身，美国抛弃了自己长期以来扶持的阿富汗政府。这一幕让美国的西方盟友寒心。西方舆论纷纷质疑美国作为盟主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美国已经靠不住了。

长期关注阿富汗和叙利亚战争的英国《独立报》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近日在专栏文章中写道，阿富汗的政局“凸显西方的严重失败”，并再次证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文指出，阿富汗的局势让其其他国家的人们进一步质疑美国的信誉，美国的盟友通过阿富汗的事例更加明白美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入侵阿富汗后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移植到阿富汗，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选举制度和政治框架。但阿富汗政府的最终垮台表明这一做法并不成功。一些西方专家开始反思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顾各国实际情况强行推广西式民主的做法。

法国外交官热拉尔·阿诺近日在法国《观点》周刊发文指出，民主不是强加的，它必须符合百姓的需求才可建立。人们无法用锤子和刺刀来建立民主，就像美国和法国曾徒劳地尝试的那样。